

北大中文文库

徐通锵文选

就中西语言学的结合而言，“结合”不是外国的理论加汉语的例子，而是一种理论创新，从不同语言的特点的比较研究中去探索语言共性的结构原理，使不同表现形态的特点都能得到统一的理论解释。

徐通锵 著/李娟 编选



徐通锵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中文文库

徐通锵文选

徐通锵 著 / 李娟 编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通锵文选/徐通锵著;李娟编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北大中文文库)

ISBN 978-7-301-17811-9

I. 徐… II. ①徐…②李… III: 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3130 号

书 名: 徐通锵文选

著作责任者: 徐通锵 著 李 娟 编选

责 任 编 辑: 欧慧英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7811-9/H · 2646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子 邮 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360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

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

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却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陈平原

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前 言

徐通锵先生(1931年11月16日—2006年11月25日)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浙江宁海人。1952年徐先生从浙江省立宁波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专业。1956年毕业留校后,在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从事理论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先后任北大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徐先生毕生工作在教学一线,几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同时在汉语音韵、方言、语法等领域都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尤其在语言学理论研究方面颇多创见,对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环境受到很大影响,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徐先生才真正得以专心于语言教学与研究。他的主要学术成就也都集中于此后的研究。

徐先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与同在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任教的叶蜚声先生合作,对中国现当代语言学研究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反思,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是一个正本清源的过程。徐先生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时,多次谈到这个阶段的历史总结在其个人学术探索中的重要性。这使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对汉语研究历史和现实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上。实际上,这种认真系统全面的反思对当时刚刚重新步入正轨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也是极为必要的。这期间徐先生和叶先生合作发表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1979)、《译音对勘与汉语的音韵研究》(1980)等多篇分量很重的论文,在学界很有影响。徐先生认为,中国语言学研究必须改变理论上的“空对空”或生搬硬套,要立足于汉语走西方理论和汉语言实际相结合、现代理论和中国

传统研究相结合的道路。这成为徐先生在此后的语言研究中所一直坚持的方向。

二位先生合著的《语言学纲要》也是这一时期的成果。这部关于基础语言学理论的教材以结构主义语言观念和理论方法为基础,结合汉语的特点,对语言系统的性质做了简明清晰的阐述,在各高校的语言学教学中影响非常广泛。

对历史的回顾也促使徐先生明确了自己进一步语言研究的切入点。他认为,从语言理论和汉语实际结合的历史看,汉语的历史音韵研究要比汉语语法研究成效好,它的研究思路是值得借鉴的。由此徐先生开始侧重于历史语言学研究,进入其语言研究的第二个阶段。80年代初徐先生曾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进修访学一年。他把主要时间精力用于了解历史语言学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向,尤其对新兴的语言变异的思想非常感兴趣。这影响了他后来的历史语言研究。在这一研究阶段,徐先生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方言调查。他努力把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现代方言材料、传统音韵学的文献材料及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为解释汉语的方言变异现象和历史音变的关系,探求其背后的机制原理,寻找到新的途径。这一时期,徐先生发表许多有影响的论文,代表性著作作为《历史语言学》。这部著作介绍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的各种重要理论方法,并结合汉语方言和文献材料,对许多汉语音变现象做出深入的分析阐释,同时还从“文白异读”现象入手,结合语言变异理论,提出了“叠置式音变”这一新的音变方式,突破了原有音变理论的局限,推进了历史音变理论的发展完善。

徐先生的历史语言学研究在理论上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同质的、静态的、封闭的语言观念,强调语言系统的多层次性、变异性和动态平衡的状态,同时也揭示出语言结构中语音、语法等不同层面间的结构关联。这种新的理论视角和在历史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促使徐先生对汉语结构特点以及汉语研究的根本点有了许多新的思考。根据与徐先生的私人交流及公开发表的访谈录,在80年代后期,他就已经开始思索此类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徐先生的关注点开始由汉语的历史音韵研究转向对汉语言整体的研究。90年代初,徐先生提出了以“字本

位”为核心的语言理论,进入他语言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

这一阶段徐先生发表论文数十篇,论著多部,代表性著作为《语言论》(1997)和《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2008)。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从最初提出到后期的发展,中间经过不断的修改、补充和完善。李娟《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语言理论概述》(2008)中曾把整体理论观念概括总结为七个方面:

1. 语言是对现实的编码体系。编码机制是制约整个语言结构运作的根本,它取决于最基本的结构单位的音义关联方式。编码机制的差异造成不同语言类型的差异。

2. 编码中如何借助理据关联,是导致整个编码机制的根本,音义关联方式是其表现。这一原则导致在各层单位的结构构成中有的语言重语义关联,有的语言重语形关联。对于前者,研究中重要的是要揭示语义范畴的性质,对于后者,要归纳语法范畴的功能。

3. 语言的表层形式是容易发生演变的,但底层的编码原则是稳定的,要揭示这一底层的原则要把语言的历史和现状结合起来,作统一的解释,不宜割裂语言的共时和历时。

4. 不同性质的文字与有声语言间有不同的关联方式。文字不仅仅是对语言的记录,文字反映着语言的特性,还有对语言的反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影响语言的演变过程。

5. 从以上几方面看,字是汉语中最基本的结构单位,这一性质贯穿古今。汉字文字编码与汉语结构单位字的编码原则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语义关联是编码原则的基础。字的编码原则延伸至字以上的结构。

6. 在汉语语法中,字无疑承担了语法功能,但无论是字类还是虚字都是以基本的语义属性起到结构关联的作用,与语形语法有所不同。

7. 汉语语法中各种语义范畴最终体现在表达中,与说话者的主观性不可分。其中有定范畴是最重要的,这一范畴在汉语和印欧语中的差异,正与汉语句子的开放性和印欧语句子的封闭性相对应。语言编码机制的不同,最终在语言表达的实现中,表现出不同语言巨大的差异。

综观徐先生的三个研究阶段,成果卓著,著述甚丰。这本篇幅有限

的文选该如何取舍呢?总体看来,徐先生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在学界影响更为广泛,代表性的著述已收入《徐通锵自选集》以及自选论文集《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而徐先生第三阶段有关字本位理论的研究,用时最长成果最丰富,其研究成果虽然在第二本自选论文集《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中收入多篇,但从整个理论体系的阐述来看还不够完整,特别是徐先生晚期在遗著《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一书中阐述的一些重要思想在以往的文集中都反映不出来,这对于读者理解其后期的语言研究观念是个缺憾。基于以上考虑,反复斟酌后,确定这样一个选编原则,在尽可能较完整地反映徐先生语言学思想的前提下,侧重收入后期的著述。下面是选取文章的题目,括号内为首次发表时间:

1. 宁波方言的“鸭”[ɛ]类词和“儿化”的残迹(1985);
2. 音系中的变异和内部拟测法(1989);
3. 变异中的时间和语言研究(1989);
4. 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1990);
5. 语义句法刍议(1991)
6. 音系的结构格局和内部拟测法(1994)
7. 说“字”(1998)
8. 编码的理据性和汉语语义语法形态的历史演变(2004)
9. 字组的生成和语汇中的语法规则(2008)
10. 字的语法化的“阶”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2004)
11. 语言范畴的性质和表达的研究(2008)
12. 有定和无定(2008)

大致上前四篇是徐先生历史语言学研究时期的著述,第五篇到第十二篇是字本位理论时期的著述,但所涉及的内容不能截然二分。第四篇已隐含字本位的思想,第六篇主要是关于历史语言学理论的阐述。下面就每篇著述的内容做简要介绍评述,希望对阅读理解有所帮助。

1. 《宁波方言的“鸭”[ɛ]类词和“儿化”的残迹——从残存现象看语言的发展》

这篇论文首次发表于《中国语文》1985年第3期,此后曾收入河南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徐通锵自选集》(1993)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选论文集《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2004),是徐通锵先生历史语言学研究的一篇重要的论文。

宁波话“鸭”有两种语音形式,一为[aʔ],一为[ɛ]。以往赵元任等语言学者认为[ɛ]类语音为白读形式,当地人也认为是口语形式,但论文通过分析论证,否定了这一说法,证明“鸭”[ɛ]类语音为儿化合音的残迹。论文首先从时间层次、历史音韵地位等方面分析了“鸭”类词和一般的文白异读现象的原则区别,指出“鸭”类词的[ɛ]韵是和咸山摄归并的结果,也就是说原本是有鼻音韵尾的,同时和宁波方言中另一类“伯”[pā]类词相比较,指出其鼻化韵源于原有的鼻音韵尾,“鸭”类词和“伯”类词消失的鼻音韵尾不是原有的,而是外加的高于语音层面的语言单位。这一推断也得到了历史文献材料的印证。进而论文与其他方言相比较,进一步分析这种残存因素的性质。通过对相关材料的研究,论文指出这两类词的变音的性质是儿化形式。接着,论文就儿化的性质对儿化在各个方言的表现做了比较分析,探讨了几化这一语素平面的事实如何在变化中逐渐消退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和纯语音演变的复杂关系。这篇论文由语言中的变异现象入手,深入发掘各种材料,区分出语言不同层次的音变,分析论证精彩独到,对于历史音变、方言、儿化变音等许多研究领域都称得上是一个经典的研究范例。

2.《音系中的变异和内部拟测法》

论文首次发表于《中国语言学报》1989年第三期,后曾收入论文集《徐通锵自选集》和《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这是一篇结合汉语事实,探讨结构、变异和音变间的制约关系的研究论文。论文全篇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内部拟测法的产生和基本观点,指出其原有的理论的局限并提出改进方法。原有的内部拟测法立足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同质说,着眼于规则结构中的不规则的差异,限制了研究范围,具有局限性。论文提出,改进语言内部拟测的研究,就要着眼于言语社团中实际运用的语言状态,把语言看成有序异质的结构,从中理出语言演变的线索和层次。从变异中进行结构的动态分析,用语言事实本身说明发

展的原因、过程、取向和规律的,都属于语言内部拟测的研究。

第二部分:探讨分析汉语语音变异中的文白异读现象。论文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叠置:1. 不同系统的同源音类的叠置;2. 同一系统异源音类的叠置。两种不同性质的叠置中的白读有不同的演变命运。前者取决于和文读形式的竞争结果,后者决定于与其叠置的异源音类的演变。论文分别以山西闻喜方言、祁县方言等为例,分析两种不同类型的叠置式音变的演变过程,揭示出共时语音结构中沉积的历史时间层次,并指出这是以语言系统同质说为基础的内部拟测法难以做到的。

第三部分:讨论离散式变异现象。论文以宁波方言声调的变异为例,分析其调类在语素读音中的逐一变化的过程,论证了离散式音变的性质和特征。论文以离散式音变的特征解释了《诗经》异调相押的现象,指出汉语声调从无到有、从逐步形成到最后定型,是通过扩散的方式进行的,这是导致所谓异调相押现象出现的原因。离散式音变在演变的过程中如果有一种新的音变力量介入,就有可能中断,在音系中留下差异,宁波方言中覃韵字的演变体现了这一点。

第四部分:从理论上阐述了从差异中探索语言的发展是语言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论文把语言系统中的差异看做是从结构分析中探求语言演变的突破口,同时认为方言间的比较以及文献资料的运用,也是内部拟测研究的重要补充,提出在内部拟测研究中结合历史比较法和书面文献材料,可以更好地认识音变的过程和时间层次,探求音变规律。

论文有理论阐释,有对不同层次的变异现象的个案分析,是徐先生关于语言变异和历史音变理论的一篇代表性文章。

3. 《变异中的时间和语言研究》

论文首次发表于《中国语文》1989年第2期,后收入《徐通锵自选集》和《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也是徐通锵先生关于变异、结构和音变间的制约关系的一篇重要理论著述。

论文首先大致回顾了从比较语言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反思这些语言观念中的时间观,指出对时间的认识是语言研究方法

论的重要基础,历史语言学强调时间的线,结构主义强调时间的点,但点与线是分离的,因而在研究中都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论文进而提出,通过语言变异的分析,可以对时间进行综合性的全局的考察。论文以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 w/v 的变异、宁波话的声调为例,说明共存的变异形式浓缩着时间的量,是时间的一种横向表现形式。这需要找出变异形式与社会因素的相关关系,弄清变异形式的先后、方向、目标。通过对变异的分析对时间进行空间计量。

论文认为,处于变异过程的连续性单位,体现了系统的连续变化。变异产生之初是无序的,当变异比较广泛地被某一社会人群接受,与社会因素有了倾向性的稳定的联系,才会转化为有序的变异。其中年龄因素与时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有序的变异转化为结构之前,又表现为无序。有序无序的相互转化是语言结构动态性的一种表现。论文以宁波方言尤、幽韵读音的变异为例,分析了变异和音系结构调整的关系。变异的目标是尤、幽韵和鱼、虞韵的合流,当有序的变异实现自己目标后,控制变异的各种因素则退出了演变过程。当出现语音的合流时,心理认同先于言语行为。当实际言语行为的差异也完全消失后,这一变异的有序、无序的相互转化运动也就结束,连续性的变异转化为离散性的结构。摆脱变异的连续性,实现离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论文以宁波方言淳、真韵知、章组字的变异为例,分析了其中的不同时间层次、不同性质(文白),揭示出复杂的变异形式背后隐含的演变轨迹。

论文以多个变异形式分析的实例,从横向时间的研究侧面揭示出语言演变的历史。这一研究视角吸收了历史比较法的精神,同时又完全立足于语言现实,立足于语言的结构,避免原子主义的缺陷,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共时结构中时间的点与历史演变的时间线相互分离的欠缺,展现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4. 《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

论文首次发表于《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后收入《徐通锵自选集》和《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总体上仍属从语言变异和结构的关系探讨语言历史演变原因的研究。

论文首先回顾了前人对语言演变原因的研究,对萨丕尔、马林丁内以及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关于音变原因的解释做出了评述。进而论文提出了改进因果关系研究的途径。论文提出,语言系统并非一个封闭的静态的系统,而是开放的,具有自发的自我调整机制的系统,是有弹性的。变异是探讨这种自发的自我调整的杠杆和机制的理想材料,把变异和结构联系起来,从结构中考察变异的产生和演化,就可能发现系统进行自我调整的原因。论文指出,线性的组合结构难以系统地解释语言的演变,研究语言演变的基础只能从非线性结构中探索语言演变的因果关系。

进而论文提出了“结构关联”的概念,是指突破了线条性的单位之间的相关关系。论文认为,在一个结构层面内部或者在各个结构层面之间,如果能通过对非线性的结构关联的分析而找到结构不平衡性,那也就找到了探索语言演变因果关系的重要线索。语言是有层次的,某一层次的结构平衡性运动可能导致另一层次的不平衡。如果语言结构处于完善的平衡对称状态,语言的生命就完结了。论文以北京等地方言浊声母的产生、宁波话韵母系统的变异以及声母的浊音清化等例说明,不平衡性导致的变异会促使结构自我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进而论文以山西祁县方言的卷舌音以离散式变异渐次归入舌尖塞擦音系列为例,说明结构的不平衡涉及语音层面和语法层面、语义层面的结构关联。结构的不平衡性决定了语言演变的必然性,而具体的演变途径和方式则和偶然性相关。论文以实例论证了偶然性在演变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已经指出,音节与词的一对一的关系是汉语结构的重要特点。对音节和词的一一对应的干扰破坏会使结构不平衡,促使结构关联自发调整。论文认为,汉语中的变声、变韵和变调都是用单音节结构规则去改造融化复音词的语音面貌,使之单音节化,以保持音节与词之间一对一的平衡对应的结构关联。在对语言变异和音变原因的探讨中,徐通锵先生已经开始转向对语言结构整体特征的把握。其中,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结构关联”的思想以及对汉语音节与词一对一的结构特征的认识也是徐先生后期字本位理论的基本观念,可见其语言研究思想的连续性。

5. 《语义句法刍议》

论文首次发表于《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后收入《徐通锵自选集》和《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在收入这两本论文集时略有修改,这里选用的是修改后的文本。

这篇论文是徐通锵先生明确提出其汉语字本位观点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徐通锵先生第三个研究阶段开始的标志。论文进一步阐述了以往提出的结构关联的思想,同时明确提出了汉语“1音节·1概念·1字”的基本结构格式,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关于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思路。

论文首先分析语法研究的发展过程,指出语义作为语法结构的一项内容已经确立了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论文借鉴兰姆(S. M. Lamb)层次语法的思想提出了语义句法的概念,认为语义句法在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占的比重不同,这取决于语言系统的内在结构基础。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其结构基础的结构常数都是“1”,其结构关联方式就体现在“ $1 \times 1 = 1$ ”这样一个结构格式中。论文提出,英语等印欧语的结构基础是句子,其结构格式“ $1 \times 1 = 1$ ”表现为:1个主语 $\times$ 1个谓语=1个句子。印欧语控制语言结构特点的常数“1”在句法层,词受制于句子,词类划分由句子控制,名词和动词是两大基本类别。以主语和谓语一致原则为基础构成基本的形态句法规则,是语法型语言。汉语的结构关联基点是字,其结构格式“ $1 \times 1 = 1$ ”表现为:1个音节 $\times$ 1个概念=1个字,是语义型语言,突出语义句法。语言结构基础不同决定了它们语法规则的重大差异,需要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去描写。

论文在探讨不同语言的结构关联时讨论了不同语言的编码原则问题。这个问题是徐先生字本位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不仅音义结构关联与此相关,语言整体结构方式及语言范畴的确定等都受制于此。徐先生在此后的研究中对此不断深入探讨,这里提出的一些观念在晚期研究中有更深入的阐述。

这篇论文初步提出了汉语语义句法的结构框架,认为“主语—谓语”和“话题—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原则,二者有许多不同,应严格

区别开,不宜把“话题—说明”纳入到“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中去认识。汉语语义句法可以用“话题—说明”的结构框架来研究。这个语义句法框架只是个初步设想,与徐通锵先生字本位研究后期系统的理论体系几乎没有可比性,不过以字的语义关系为基础研究汉语语法结构,这一点没有改变。

6. 《音系的结构格局和内部拟测法》

论文原载于《语文研究》1994年第3—4期,后收入《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收入时有修改,现依据修改后的文本。这篇论文从研究内容上看属于历史语言学研究,探讨如何运用内部拟测法的基本精神,扩大研究视野,用现实语言的音变机理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从而在理论上深化内部拟测法的内涵,扩大理论的解释范围。另一方面,这篇关于汉语历史音变理论的论著也是徐先生汉语“字本位”观点在汉语历史研究中的体现。这篇论文正是从“字”的音节结构着眼阐述了汉语的音系结构格局和音变机理,从而揭示了现代方言和历史音变的关系。

论文提出,内部拟测法的基本精神是就语言系统的内部根据去解释语言的演变。以往内部拟测法所依据的内部根据的表现形式只是印欧语的结构特点,我们可以根据不同语言的结构特点扩大内部拟测法的基础,找到普遍适用的原理和原则。论文借鉴了萨丕尔(E. Sapir)关于语音格局的理论和拉波夫(W. Labov)“用现在解释过去”的一致性原则,提出语音是易变的,但音系结构格局是稳定的,二者的对立统一控制着音变的范围、方向和目标。现实的或历史的音变都难以超越格局所允许的范围。这种格局控制音变的机制也是内部拟测法的一种结构基础,可以透过现代方言事实中各种歧异的音变发现其背后演变的机制和原理,用来解释和拟测历史的音变。

就汉语的结构特征而言,“字”是汉语基本的结构单位,是语音、语义、语汇和语法层面的交汇点,音节是字的语音表现形式。汉语的音系结构格局隐含在“字”的音节规则中。音节结构格局可以概括为声母、韵头、韵腹、韵尾以“1”为基础的特定结构位置和在此位置中语音单位的交替和运转机制,韵头、韵尾的产生、消失和变化导致声母和韵腹发

生变化的机制,声韵调相互制约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背后的音变机理。

论文着重探讨了汉语音节结构中的介音(特别是*i*介音)对于声母系统的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汉语众多方言点中介音的影响导致的双唇、舌尖及舌根三个基本发音部位声母的音变过程,指出“汉语方言的声母系统的变化大多与介音的作用有关,变化的方式大体为分化、合流和回归”。进而论文把从方言演变中总结出的演变机理投射到历史音变中,以此解释历史上声母的演变,如章、庄声母的形成和演变,开合口和“等”的形成等。论文在最后一部分讨论到音系格局的调整,认为音系结构格局虽然远比具体的语音单位稳定,但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它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新旧格局间前后有继承性。汉语一个字一个音节,这一点先秦前后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声韵调三部分是否都只允许一个结构成分出现,包括声调的产生。这些变化与汉语和其他语言间的接触相关。

这篇论著既探讨了音系的结构格局与内部拟测法的相关性,为历史语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揭示出字的编码与汉语音系结构格局的重要关系,反映出字在汉语结构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7. 《说“字”》

论文首次发表于《语文研究》1998年第3期,后收入《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

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提出后,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一些争议。这其中也包含一些对理论本身的误解。而误解的产生直接涉及到对“字”的概念的理解。针对此类现象,这篇论文系统地阐述了“字”的内涵,字在汉语系统中的地位,字的生成机制,对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共性特征以及相关的语言理论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文的一个重要语言观念是,语言是对现实的编码体系,音义关系是语言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而“字”是音义关联的基点,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

论文阐述了字与语素在系统中的地位和音义关联模式上的根本不